

我国城市群区域联系发展趋势

作者: 朱英明 发布时间: 2003-11-20 13:08:04

在我国城市化持续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群体”的城市化现象。新的城市(镇)不断涌现,城市(镇)空间不断扩展,城市由少到多,由分散孤立到形成网络,以至形成组群,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极为明显。这种群体的城市化现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辽宁中南部地区、京津唐地区和四川盆地等城市群地区更为突出。这实际上是区域城市(镇)间频繁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交互作用的结果。树立城市群及其联系的理念:有利于各城市认清本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地位,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区域经济,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的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进一步增强其集聚与辐射功能,强化城市间的功能联系。同时,有利于各城市从区域的角度考虑城市的发展与布局,树立城市发展的“大区域”观念,打破就区域论区域,就城市论城市的封闭陈旧的发展观念。这样,城市的发展将会置于国家、大区、市域、地方等不同的空间规模下,自觉地接受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市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所构成的规划体系的宏观指导。有利于增强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群体效益。

一. 城市群区域发展中的联系网络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发生发展的支撑条件是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主要动力源是作为地区经济核心城市的特大或大城市,区域景观表现是城市组群的集合体。城市群的本质特征是区域内城市间存在的联系网络。

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由自然联系、经济联系、人口运动联系、社会相互作用联系、服务传输联系、信息联系,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等组成的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就我国目前城市群区域联系来说,自然联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成为城市群区域联系网的基础。最主要和最普遍的联系是经济联系、人口运动联系。伴随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第三产业在区域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升,服务传输联系强化。城市群经济实力的壮大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社会相互作用联系将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信息联系正以超常规、跳跃式的速度发展。城市群区域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经济生活的众多方面与国际接轨,特别是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以及市民素质的提高,我国的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将会为城市群区域的联系网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保障。

当人类社会伴随着知识经济步入信息时代之际,现代通信技术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以激光技术、光纤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为支撑,使通信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一种高可靠性、大容量、智能化、综合化,既能适应各种通信的需要,又可用于实现电话、电报、数据通信、传真、可视电话以及电视会议等各种通信业务的一体化通信网络——综合服务数字通信网(IS—DN)产生了。ISDN是包括电脑和所有通信技术在内的网络化的高级形式。新的通讯技术的应用导致新的产业的不断产生壮大,其中最突出的是人造卫星——通信产业、光导纤维和光纤通信产业,电信产业与电信服务业等。因此,未来信息联系在区域联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会愈加重要。

我国的城市群区域联系有两种类型,大都市区间的联系以及大都市区与非大都市区间的联系。不同的联系类型具有不同的联系内容、性质、规模和速度,它们在城市群区域构成了一个联系网络。

二. 城市群区域联系发展趋势

1. 城市群区域出现三种类型的技术空间聚集

通过国外贷款、技术进口和商品贸易等渠道,城市群区域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加快。出现了福特主义成熟特征,比如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以及后福特主义的新技术和组织的可能性。社会空间过程的载体是公司网络,尤其是大——小公司网络。这些产业和地理环境产生了部门和空间上不同的技术和生产联系的聚集。因此,将会产生三种典型的技术——空间聚集(见表1)。

表1 城市群区域技术—空间聚集的三种类型

技术水平	部门(例如)	支配的劳动力过程	公司间联系	灵活性类型
较高	微电子	灵活的	大量高技术专门化的小公司(联合、半横向一体化)	系统的灵活性
中等	汽车	新福特制	自动化大批量生产的大公司与转包的小公司(垂直分解)	技术的灵活性
较低	纺织	新泰勒主义	劳动力密集的大公司与依赖的车间(横向的半一体化)	数量的灵活性

2. 新技术体系结构出现，新的高技术生产与传统部门紧密的联系

城市群区域的核心城市逐渐转化成孵化新的创新产业的基地。更少的劳动力密集的新的技术体系和产业关系的建立，使产业再组织的方式发生变化。新泰勒主义和新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远离核心城市的其它地区广泛应用，而核心大都市成为具体体现新的技术及其社会化的场所。

新的主导生产技术是由FA(最后装配)、FMS(格式管理系统)、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机器人等为代表的。大多数新技术的应用依赖于信息和微电子的通讯技术。从地理学上来说，这种创新努力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城市群区域核心大都市的技术来完成’的，其拥有大量的国家技术创新代理商和机构。核心城市企业总是最早的新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引进者。新的产品和处理技术的引进被大的联合企业公司控制，它们的新技术的应用在刺激内部分工以及生产过程的公司间的外部化方面有巨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种再组织反过来开始了一系列的生产部门、单位、公司空间的密集联系和流动。新的生产技术具有“系统技术”的特征，因为它们的作用需要全系统不同的技术单位在特殊的商品生产上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因此，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技术体系结构，Pedersen(1994)等称之为特大企业，其范围超过单一的技术企业。通过这种技术体系结构，不同种类的技术，无论是高技术的还是低技术的、全球的还是地方的、后福特主义的还是传统的，融合成灵活的技术制度以适应后福特主义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技术体系结构，城市群区域新的高技术生产(突出的是微电子)与传统的、手艺的、边缘的部门有强烈的联系。

3. 核心城市公司间联系网络多样化和多层次

在城市群区域，在从上游到下游的公司联系范围内，分解的生产组件和单位间对新的生产技术一体化的联系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因此，新的技术过程在大都市区的应用导致公司间形成密集的网络。核心城市区域大的支配性的公司网络以这样的方式构造，因此，许多小型专业化公司聚集在大的主导公司节点的周围。公司间网络的加深被大公司和小公司间快速扩展的转包关系所发展。在地理上，最密集的公司间网络发生在城市群区域核心大都市。

核心大都市公司间联系变得非常多样化和多层次，大都市网络趋向于垂直方向的加深。垂直加深发生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公司间联系的向上的分支，这产生于公司寻求与专业公司、跨国公司、大学或国有机构以及其它的企业集团等形成的战略上的联合，目标是获得对生产的创新投入，保持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另一个方向是公司间联系的向下的分支，沿公司间等级链向下到第二或第三层的转包小公司的转包工作，以便开发他们的适当位置的技能和生产优势。沿着此链进一步向下，大的灵活的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到达车间，在那里计件工作由取得低工资的家庭主妇和老年人进行。

4. 网络大都市生产制度确立了全球——地方资本循环的联系节点

网络经济是上游阶段(R&D)设计，经营管理和下游阶段分配及销售，在重要性方面不断增加，而生产的中心阶段逐渐衰落。城市群区域由于产业重组，新的产业类型出现，其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也明显地发生变化。就部门来说，新产业主要有三个部门：一是传统的以手艺为基础的产业，例如服装、印刷；二是技术和信息密集的产业，例如机械电子和软件；三是快速发展的商业服务业，带来了收入的增加和

产业的扩张。

大都市区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变化，集中在新的生产与新的消费联系功能上。这种融合通过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变得更为明显。制造业活动达到其最高点以后，大都市区经济的支配部门为服务部门。在服务部门中增长最快的是所谓的“生产性服务”部门，例如设计、广告、信息处理、金融、软件、房地产等。对于这些服务需求的主要推力主要地来自企业集团控制的灵活的生产的全球化以及地方化循环。另一方面，新的商品消费开始出现。消费的支配方式从有形货物转变到时间物品、影像物品和感官商品象视频和音频等的消费。变化的消费爱好反过来刺激新类型的消费产业的扩张。

新的大都市经济将围绕高附加值服务的生产而建立。通过大都市经济的地方的和全球地区网络密集的相互作用，当对新的服务的需求和供应得到满足时，大都市就形成Veltz(1991)称作的“网络大都市”。在那里货物、服务和信息流不仅通过一体化的全球网络来连接，与全球的资本循环相互联系，而且通过地方的通讯网络来连接。

5. 城市群区域新型的大都市劳动力市场出现

产业重组产生了对于具有新的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当新的生产技术核心开始运转时，引起级别较高的劳动力市场、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管理工人的分化。城市群大都市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由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活动的替代，劳动力和设备合理化的采用，以及服务业的增长，大都市灵活的产业化引起制造业劳动力的下降，尤其是直接生产工人的下降。

第二，在制造业范围内，在大公司就业的核心地区的技术工人、管理工人和服务工人与大多数在小公司工作的从事直接生产的劳动工人之间的就业发生两极分化。

第三，服务业变成新的就业来源，主要集中在日益增加的非全日制工人和临时工。在服务部门内，临时就业在零售、餐饮业之类的传统的服务部门比在金融、保险和信息的服务部门增长要快。

第四，灵活的就业方式使劳动力流动非常高。与新机器的采用及其工作的重新安排和转包一起就业的形式将更加灵活。

第五，空间上，大都市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不同的再生产区。每一个再生产区与次大都市生产网络的聚集相一致。在物质福利快速提高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等级在消费和再生产领域变得更加显著。新的再生产空间呈现以下新的形式：传统的产业工人社区，正在快速地消失；新的服务阶层(突出的是转包工人)社区，正在大都市周围散布。

注：本文为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重大项目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批准号：2001ZDXM790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姚士谋. 中国的城市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
- 2朱英明. 武汉经济协作区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对策.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1999(2)
- 3 Cho, Myung-Rae. Flexibilization Th^osh Metropolis: ne Case Of Posffordist Seoul, Korea, Intemationo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 (1997)
- 4 Persen, P. O. et al. (ed8.) (1994) Flexibke Specialization: 11le Dynamics Of Small-Industrieg in the South. II Publications. London.
- 5 Cook, P. And K. Morgan (1993) 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s in Corporate aIld Regional Development. Society aIld Space 11. 5.
- 6 Sayer, A. And R. Wakker (1992) The Social Eco[or IIy: Rethinking ttle Di. vision Of Labott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